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龔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六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9 冊

唐代詩僧的創作論研究
——詩歌與佛教的綜合分析

彭雅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代詩僧的創作論研究——詩歌與佛教的綜合分析／彭雅玲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
98〕

目 4+26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六輯：第 9 冊)

ISBN 978-986-6449-60-4 (精裝)

1. 唐詩 2. 詩評 3. 佛教文學

820.9104

98013881

ISBN - 978-986-6449-60-4



9 789866 449604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六輯 第九冊

ISBN : 978-986-6449-60-4

唐代詩僧的創作論研究——詩歌與佛教的綜合分析

作 者 彭雅玲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第六輯 25 冊 (精裝) 新台幣 3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PDF

唐代詩僧的創作論研究 ——詩歌與佛教的綜合分析

彭雅玲 著

作者簡介

彭雅玲，民國五十四年生，台北市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副教授。著有《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國語文教學理論與應用》（合著）、《僧·法·思——中國詩學的越界思考》。主要研究的範疇包括中國詩學、佛教文學、文學理論及批評、視覺文化、漢字教學等領域。

提 要

自佛教傳入中國便與中國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當前學界研究中國佛教文學者，處理的焦點多集中在小說、散文，而詩歌是較缺乏的一部份，尤其對詩歌理論的關注更少。筆者著眼於「詩僧」兼具詩人和僧人雙重身份，因此藉著唐代詩僧創作論這個課題的考察，具體探索唐代詩歌與佛教間的交互關係。本文所嘗試的研究和進路，只是一個起步，正如副標題「詩歌與佛教的綜合分析」所標示，筆者是希望建立一個詮釋佛教詩歌理論基礎模式，並呈現詩歌與佛教二者間動態的發展關係。本文的寫作不單旨在透過唐代詩僧的創作論探索語言與真理的關係，以呈現文學與宗教間的互滲情形。筆者亦嘗試藉用當代思潮中對於語言的研究的方法，去探討詩僧的創作論及語言觀，從而指出詩僧在理論及作品背後所彰顯的理論意義。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選題的意義	1
第二節 研究的目標	2
第三節 研究的進路	4
一、類型研究	5
二、語言研究	6
第四節 研究史的回顧：關於唐代詩僧的研究	9
一、古人對唐代詩僧的批評	10
(一) 文人的看法	11
(二) 僧人的看法	15
(三) 小結	17
二、今人研究唐代詩僧概況	18
(一) 輯校詩僧詩歌	19
(二) 註解賞析詩僧詩歌	20
(三) 研究專著及論文	22
1. 詩僧的分類與分期	23
2. 詩僧的生平	23
3. 詩僧的詩論	24
4. 詩僧的詩作	28

第五節 本文的架構·····	29
第二章 「詩僧」一詞考辨·····	33
第一節 「詩僧」一詞的出現·····	33
第二節 「詩僧」一詞使用背後的含義·····	36
第三節 當前學界對於「詩僧」一詞的定義·····	39
第四節 唐宋人使用「詩僧」一詞的歷史考察·····	41
一、(唐)嚴維、皇甫曾、劉長卿、盧綸、李 端、錢起、顧況·····	42
二、(唐)劉禹錫·····	45
三、(唐)高仲武·····	48
四、(唐)白居易·····	49
五、(宋)贊寧·····	51
第五節 本文對「詩僧」的定義·····	53
第三章 創作主體與創作對象——以皎然的 「境」論為中心·····	55
第一節 「境」字的意義：從一般用法到佛教唯 識的轉變·····	57
第二節 創作主體對於創作對象的呈現·····	63
一、取境之說·····	63
二、造境之說·····	72
第三節 創作對象對於創作主體的觸發：緣境 之說·····	74
第四節 創作主體與創作對象的辯證關係：境 象的虛實二義·····	77
第五節 小 結·····	82
第四章 創作手法與創作內容——以皎然、齊 己、虛中三人的詩格為代表·····	85
第一節 詩僧重視詩法的文學背景·····	85
一、初唐聲律學的繼承與發展·····	86
二、受到科考重視聲律的影響·····	88
三、因應詩會聯句品第的需要·····	90
四、從雕飾到放蕩的文學風潮·····	94
第二節 詩法術語與佛教名相的關係·····	98
一、「門」的意義及轉變·····	98

二、「勢」的意義及轉變	102
第三節 創作技巧舉隅	106
一、切題的要領	107
二、對仗的方法	109
三、構句的經營	113
四、題材的掌握	114
五、象徵與比興	115
六、用典的原則	118
七、模仿的層次	120
八、俗語的操作	121
第四節 小 結	122
第五章 創作與信仰——詩歌與修悟的關係	125
第一節 反面的立場：「詩魔」問題的提出	125
一、詩魔釋義	127
二、詩魔的概念源自小乘的傳統	128
三、詩僧對於詩魔問題的對治	131
第二節 正面的立場：詩禪理論的雛型出現	134
一、詩禪相妨到詩禪互濟的轉變	135
二、類比性的理論思維及詩禪理論的發展	138
（一）詩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靜	138
（二）詩禪對舉的大量出現	142
（三）詩爲儒者禪	144
第三節 小 結	147
第六章 語言與真理——詩語、意義與存有之間的關係	149
第一節 語言與真理：佛教的觀點略述	149
第二節 詩僧直接論述語言與真理的關係	152
第三節 詩僧展現詩語言的宗教向度	153
一、悟道	153
二、證道	157
三、明道	164
四、小結：詩僧運用詩語言的策略	171
（一）對話場域的開啓	171
（二）符碼語與感興語的交替運用	173

第四節 詩僧所呈現的對應／開顯的真理觀： 存有——詩歌——生命三者之間的辯 證關係·····	174
第七章 結 論·····	181
第一節 唐代詩僧的創作論綜述·····	181
第二節 唐代詩僧對詩論的貢獻·····	182
一、發展創作主體的審美理論：從詩格的內 容反省·····	182
二、對於詩歌創作技巧的整理：從詩格的形 式反省·····	183
三、奠定宋代詩禪理論的雛型：從詩作反省 ——理論與實際的並進·····	183
四、超越語言表述真理的困境：從詩語反省 ——對話與辯證的雙軌·····	184
第三節 唐代詩僧創作論的定位·····	184
一、就文學批評史而言·····	184
二、就禪教史而言·····	185
第四節 研究成果及未來的發展·····	186
附 錄	
附錄一：唐僧作詩名錄及存詩數量·····	189
附錄二：歷代僧人現存別集一覽表·····	205
附錄三：中唐江左詩僧的地理考察·····	219
附錄四：從「詩」、「偈」的發展看詩僧的創作	223
參考書目·····	22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選題的意義

「詩歌」屬於文學領域，「佛教」屬於宗教領域。表面看來，好像各不相干；但是無論是有關情感的寄託與發抒，抑或是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尋與安頓，自古以來，都一直是人類所關懷的重要問題。在中國文化中，這兩方面都有顯著的表現，尤其是文學中的詩歌與宗教中的佛教，更成就了光輝的文化傳統。近代學人在這兩方面的研究成績，燦然可觀，而跨越、會通文學與宗教的研究，近年來也已經受到學人的重視。^{〔註1〕}而有關佛教文學的研究，方興未艾，更可反映這個事實。

就佛教文學言，僧侶的詩歌是一個跨越文學與宗教的特殊文化現象，可惜關注這個研究領域的人並不多。所以本文便著眼於詩僧的詩論與詩歌研究，期盼能探索並提供佛教中，文學與宗教之間的相關消息。

今考中國佛教僧侶從事於詩歌創作，可以追溯到東晉，如康僧淵、支遁、慧遠較為馳名外，尚有帛道猷、竺僧度、釋道寶、竺法崇、竺曇林。南北朝有劉宋的湯惠休（後還俗），齊的釋寶月，梁的釋寶

〔註1〕見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編：《文學與宗教——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7年9月第一版，1988年7月初版重刷）。

志、釋智藏、釋慧令、釋法雲，北周的尚法師，陳的釋惠標、釋曇瑗、釋洪偃、釋智愷等皆有詩傳世。〔註2〕自東晉至南北朝這一段時間，可說是僧人寫詩的濫觴。〔註3〕

但是本文為何選擇「唐代詩僧」為研究的對象呢？因為唐代不但是佛教的全盛時期，更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顛峰時代，無論就中國詩歌發展史，抑或就中國佛教發展史來說，唐代無疑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所以本文選擇李唐時期為研究時段。

概括的說，筆者選擇「唐代詩僧」作為研究對象，至少有三層意義：第一，從文學史來說，唐代詩僧的研究可以填補唐代詩歌發展史上研究的不足；第二，從文化史來說，唐代詩僧研究可以加強了解唐代佛教與文學互滲的關係；第三，就學術史來說，唐代詩僧的研究開啓了詩歌與宗教之間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文學與宗教兩個領域之間交際與對話的可能。〔註4〕

第二節 研究的目標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對於中國文化產生全面性的影響，其中佛教與文學兩大領域的交光互映，更生出一片豐腴的佛教文學園地。而對於詩歌與佛教雙向滲透的變化過程，至少有兩方面可供考察：我們若

〔註2〕 見《弘明集》、《廣弘明集》所收錄的僧人。

〔註3〕 王夫之《薑齋詩話》稱衲子詩「源自東晉來」，一般僧詩選本都從東晉僧人如支遁、慧遠的詩開始，單召文《禪月詩魂——中國詩僧縱橫談》一書討論詩僧的濫觴亦從東晉開始（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11月第一版）。

〔註4〕 在這裡我不用「辯證」而用「對話」，「辯證」其實包含著「對話」的意義，因為「辯證」多少意味著主體之間的相通或對立，經過相互作用最後達到相合的境界，而且是絕對精神的狀態，這時候主體已喪失了個體性。我這裡所謂的「對話」指的是說話的主體至少有二個以上，對話的目的不是為了弄清一種意義，使一主體順從另一主體；不單是主體自身的表達或呈現，而更是主體的一種更新或者是一種真理的生成；對話後主體之間並未喪失彼此的獨立性。

從詩歌對佛教影響來看，第一階段首先出現了「偈頌」詩歌化的傾向，〔註5〕第二階段是僧人直接「以詩言理」，如晉朝支遁（c.314~366）〈四月八日贊佛詩〉、鳩摩羅什（344~413 或 350~409）〈十喻詩〉等，第三階段便是「詩僧」的大量出現。這三個階段一方面是先後發生的，另一方面又是持續的在發展。至於佛教對中國詩歌的影響，則主要表現為理論上的「以禪喻詩」，與創作上的「以禪入詩」兩大特色。大陸前輩學人袁行霈先生對於禪與詩歌的關係曾有一段宏觀式的描述，以下是我對他的意見的概述：詩和禪的溝通，表面看來似乎是雙向的，其實主要是禪對詩的單向滲透。禪對詩的滲透包括在創作方面的「以禪入詩」，以及在詩學評論方面的「以禪喻詩」。「以禪入詩」就是把禪意引入詩中，可再細分成禪理、禪意、禪趣等三類詩歌。而「以禪喻詩」的內容，袁氏分成「以禪參詩」、「以禪衡詩」、「以禪論詩」三類來說明。第一「以禪參詩」指用參禪的態度和方法去閱讀或欣賞詩歌作品，是偏重在詩歌欣賞上；第二「以禪衡詩」指用禪家大小乘、南北宗、正邪道等說法來品評詩歌的高低，是偏重在詩歌批評上，代表作品有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第三「以禪論詩」指用禪家的妙諦來論述作詩的奧妙，是偏重在創作上，宋人在這一方面的資料最豐富。〔註6〕

如果廣義地理解「禪」這一個字，將它看成佛教的代詞，我們可以重新考量上面所引述詩禪文化的兩大特色。也就是說，我們不侷限於禪宗與詩歌關係的考察，而廣泛的觀察佛學和詩歌的交涉。在這樣的一種新觀照下，我們也許不難發現「以禪喻詩」、「以禪入詩」的情況，早在唐代詩僧的作品中就已經出現了；〔註7〕而這兩者又與詩禪文化的兩大特色存在著高度的類似性。本文試圖藉唐代詩僧的詩歌理論

〔註5〕參見下文「詩歌與偈頌的區別」。

〔註6〕參見袁行霈〈詩與禪〉，收入《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0月第一版），頁83~91。

〔註7〕詳見下文第三章至第五章。

與詩歌的研究，指出宋代詩禪文化的唐代淵源。此為本文撰寫的具體目標之一。

詩僧可說是具體而微地彰顯了宗教與文學兩個範疇的交光互映。通過詩僧的研究，我們可以管窺佛教對詩歌的影響。反省一般有關佛教對文學創作影響的研究，佛教興趣濃厚者，努力爬梳詩歌中運用佛學語彙、佛教事典等情形；文學興趣高者，則著力於描述禪詩內容所展示的空靈境界。這些論述雖多，但對於我們了解佛教與詩歌關係之間相互交映的動態關係，總覺有層不入之隔膜。本文試圖檢討唐代詩僧的著作，從創作理論及實際作品兩方面，具體展現佛教與詩歌創作的關係。此為本文撰寫目標之二。

子云：「詩可以興、觀、群、怨。」詩歌語言本來就可以發揮多種不同功能。或感興，或寄託，或記事，或言理，但因為僧詩作者的特殊身份，部份作者往往希望通過作品發揮宗教悟道功能。這使得這些作品展示與一般文學創作非常不同的功能，本文希望通過對這些詩歌的研究，反省佛教詩歌語言的理論特性，這是本文撰寫目標之三。

上述這三點是本文的撰寫目標，本文就是從上述三點視域來觀照我的研究對象——唐代詩僧的創作論。

第三節 研究的進路

在思索本文研究方法之前，我們需要問的是：“詩”到底是什麼？這是一個既古老而又新鮮的問題。因為對於這個問題的界定牽涉到我們如何分析詩僧的作品。換言之，採用何種研究方法分析詩作，或者運用什麼進路切入詩歌，其背後無不關涉到我們對於詩歌的看法。現代詮釋學的發展使我們明白到詮釋者不同的視域（horizons）呈現不同的觀照（perspectives）。詮釋學學者高達美（H.G. Gadamer）曾指出「視域」是人內在生命世界所隱含、先於認知的背景和界限。（註8）因此「視

〔註8〕 H.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ontinuum Press, 1975),

域」本屬主體的內在結構，而當主體與外在世界接觸而產生認知活動的時候，「視域」即從主體對世界所持的「觀照」角度反映出來。所以某一個人所持的某一特定的觀照角度去理解對象世界，便是他內在結構「視域」的呈現。不同限象的「視域」就具體呈現為不同的「觀照」角度，「視域」與「觀照」之間是緊扣起來的。而人們採用不同的研究進路，自然亦得出不同的面貌。以下先說明本文所採取的研究進路，也就是筆者經過那些思考途徑來探索唐代的詩僧，這關係著本文以何架構來呈現。

一、類型研究

唐代僧詩人數眾多，這群詩人不僅作品亡佚甚多，而且除了少部份列入高僧傳或負享盛名的僧人，他們的生平傳記資料稍可尋跡外，其餘的生平梗概，多如廣陵散。既然文獻不足徵，本文自然不能採取學案式的作法，對詩僧做個別的傳記研究。筆者重視的是「類型」的研究，目的自不在對詩僧生平的了解，而是希望通過大量詩作的歸納、整理、分析，建立較具解釋力的理論模型，以便對唐代詩僧作一通盤的掌握。而要建立這理論模型，則首須通過「類型」的把握。

至於什麼是類型研究呢？類型研究的外延（extension）很寬，諸如題材、主題、情節、人物、文體類型、結構類型等等都可以是研究的對象。^{〔註9〕}在這裏我所謂的「類型」，是藉用文學批評中常用的一個術語 type，是指我們研究的對象具備某些成分，而這些成分使他們看起來很相似，因此我們便把這些對象歸為一類型。借用現代語言哲學的開山祖師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術語，我們也許可稱之為「家族類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文學批評中 type 一字通常有二種用法，其一指具有可下定義的明顯特徵的文學類型（genre）或

p. 269.

〔註9〕見趙毅衡、周慶祥編《比較文學研究類型》前言（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種類 (kind)，另一用意表示可作為某一類型人物的代表 (character)。

〔註10〕由此可見，類型一詞往往具有一種象徵性、代表性的概念。

基於詩禪文化所表現的兩大特色，在理論上主要表現為「以禪喻詩」，在創作上主要表現「以禪入詩」，因此筆者首先分出「理論」和「創作」兩大主要類型去考察唐代詩僧，不過，我們在主要類型之下，亦可以再分割出許多不同層次的次要類型，不斷細分的結果，次要類型便可稱上數量繁多了，但在眾多次要類型中，往往有某個或幾個次要類型是最能突出主要類型的特徵，因此這個次要類型往往便成了主要類型的重要屬性之一，這個次要類型既是某一主要類型的成員，當然具備了主要類型的特色，由於這個次要類型可代表其主要類型的重要特徵，所以這一個次要類型便可作為這個主要類型的代表，在這裏我姑且稱之為「類型的類型」。

當然「類型的類型」是建立在比較的程序上，並不是憑空虛設的，簡單來說，我們所謂的「類型的類型」，其所指涉的內涵並非類型成員中唯一獨特的，而且不因時間或地域失其鮮明的代表性。

依上面的標準，首先我們從詩格著作檢視詩僧的理論。如皎然討論詩境的問題，不僅開啓了唐人境界論的美學領域，更是為宋人「以禪喻詩」開了先鋒，因此皎然的「境」論，足以充份代表詩僧「理論」部份的一個重要類型。其次，我們從詩僧的創作反省其所涉及的理論意義，如詩僧詩歌中提到「詩魔」、「詩為儒者禪」的問題，便關涉到詩歌與修悟這個命題。

二、語言研究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學術思潮最大的特色是把「語言」提昇到中心地位來討論。「語言」從一個被視為是表達的工具，一躍而成為二十世

〔註10〕參見林驥華編《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辭典》，頁204（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顏元叔主編《西洋文學辭典》，頁768（臺北：正中書局，1991年9月第一版）。

紀哲學、美學研究所關注的重要課題。〔註11〕這個思潮的重要奠基者自然是維根斯坦，〔註12〕維氏的哲學取向開啓了英美分析哲學的傳統，哲學界認為這是一次「語言的轉向」(Linguistic turn)。〔註13〕雖然學界一般都將英美分析哲學與歐陸傳統哲學看成為兩大對立的潮流，但是，部分由於分析哲學所引起的對語言的興趣，歐陸哲學陣營中，也興起了對語言的探究，使得語言哲學的探索在英美邏輯分析之外，加添了文化學甚至是存有學的理趣，其中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對詩的語言的洞見，更是影響深遠。〔註14〕他的弟子高

〔註11〕參見涂紀亮著《現代西方語言哲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王一川著《語言烏托邦——20世紀西方語言論美學探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涂友漁、周國平、陳嘉映、尚杰著《語言與哲學——當代英美與德法傳統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等書。當今哲學、美學、文學的研究都指向「語言」一途。

〔註12〕有關維根斯坦的介紹，請參看(美)Morton. White編著，杜任之主譯：《分析的時代——美國二十世紀的哲學家》，第十四章「語言的用法」，頁265~279(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12月版，根據美國1955年新美世界文庫出版社出版的「導師哲學家叢書」之一出版)。

〔註13〕首先提到「語言的轉向」這一詞的人是柏格曼，他說：「所有的語言學哲學家，都通過敘述確切的語言來敘述世界。這是語言的轉向，是日常語言哲學家與理想語言哲學家共同一致的關於方法的基本出發點。」見《邏輯與實在》，頁177(威斯康新大學出版社，1964年版)。羅蒂則直接把這一「轉向」視為「語言的哲學革命」，他說：「通過改革語言，或通過進一步理解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言，可以解決甚至排除哲學上的種種問題。」見《語言的轉向》導論，頁3(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7年)。

〔註14〕德國現象學學者海德格是二十世紀影響最廣、最偉大的重要哲人之一。其語言觀可以說是一種存在主義現象學的語言觀。他認為：語言是存在的顯現與人的言說的統一。人自以為是語言的主人，其實語言才是人的主人。所以，存在的語言是首出的(即存在的顯示和指示)，其次才是人的語言(即人對於存在的言說)。海氏並指出：詩在語言中產生。一切冥想的思都是詩，一切創作的詩都是思。真正思想的語言是詩意的，因為真正思想的語言是真理的言說，而詩意語言也正是真理的言說。海德格在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詩·語言·思》(彭富春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思想者書系，1991年2月初版，1991年11月初版三刷)、《走向語言之